



宋晓文著

方寸美術 六十年

同慶
己未



一部伴随新中国发展步伐的史话
邮票艺术发展历程的真实记录
艺术大师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女士倾情题签



宋晓文著

方寸美术六十年

宋晓文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方寸美术六十年/宋晓文著.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5

ISBN 978-7-211-06307-9

I . ①方… II . ①宋… III. ①邮票—美术史—中国—现代 IV. ①F63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6497 号

方寸美术六十年

FANGCUNMEISHU LIUSHI NIAN

作 者：宋晓文

责任编辑：代媛媛

出版发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fjpph7211@126.com

地 址：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350001

经 销：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福州千帆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福州市南平东路 86 号金城投资区新店楼

邮政编码：350012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8.25

字 数：400 千字

版 次：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书 号：ISBN 978-7-211-06307-9

定 价：5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邮票设计艺术是美术的一个侧面，方寸画面也是记载美术发展的重要载体。本书以邮票设计艺术六十年的历程为线索，从新中国发行的400余套邮票中寻找与美术有关的人与事，将邮票设计中的美术事件与相关美术家的创作心路历程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讲故事的形式串联出一部方寸美术发展史。

Stamp designing art is an epitome of art. Pictures on stamps are also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the art development. This book, based on the progress of stamp designing art in the past sixty years, presents the people and the stories concerning the 400-odd stamps issued in New China, creatively combines the art events in stamp designing with the creation journey of the artists involved and shows us the history of stamp art development by the means of telling stories.

方力美术六十年

既往开来一甲子

答宋晓文昌填词致國

邮票印文六十年之方作方
方美龙六十耳向世

周安達源於香港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福建社团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周安达源先生题词

晚文二函和你十年磨一剑的力作（方案于宣统十六年将付印，线稿高宗。如果我没记错，这封信件在邮学研究上已有三刻了。从78年到88年，经磨了一刻三折中国画亦与邮票同世，你开始入门。88年至99年，信文磨了一刻三折中国邮票（学术论文）和印制邮票之门，发行、组织模版等。三天接踵而至，未近作的却似后章，感到你是花枝招展，仕女如歌，邮学学术研究的制高点。雅擅邮票设计是美才更的一幅侧面。但找查阅自二〇〇四年来的中国美年鉴，还没有收录邮票设计（见图），且又方寸玉成大器，真视同珍宝。所以这个立论之上说，你研究的范围广阔，但做的却是一件大事，一生一世。

周安达源先生致本书作者的信



望。廿五年来，你在集邮学上努力跋涉，出类拔入，可谓名声鹊起，前有声名。这些年来，我之所以保持才集邮的兴趣，保持见到信封上的邮票此想无忘下，就是上合于你的目标，全称你不断地带新书文字，追述邮史，大讨论，集邮，让邮在学术的高处。引者之等，凡小小的文章中，以及及其他人的文章里，得到一种高尚的精神享受。我也借此机会，向你（该感谢）一些你所以扎实的功底，（该感谢）你的学术文章上取得至大的成绩，我和三明邮事中心，同时学习，都在期得三益。邮票作为发行量巨大的商品，不印刷品，市场上太多的邮票都是增值，你信中却是皆慧与内涵，反差过大，你修习能吗？打住，问你办，否于十二月四日

序

张善文

我与晓文的同窗之谊，始于春风化雨的1977年高考之后。那是特殊的大学年华，我们均考取福建三明师范专科学校。他不无感慨地对我说：“按年齿，你应当长我一辈啊！”然而，我们竟成了同班同学。后来，我提前考研去了另一大学，与故纸堆结下不解之缘；他毕业后先任教，再从政，复又步入异彩纷呈的集邮领域。虽术业或殊，但我们的友谊不改初衷。直到某日，发现他的集邮学术成果令人刮目相看，我终于明白，不可“倚老卖老”，从此应改称他为“晓文兄”了。

今天，奉读他的新作《方寸美术六十年》书稿，脑海顿时浮现出三十多年前我将所集旧邮票赠送他的情景：那是充满欣喜的年轻而略显稚气的脸庞，其眉宇间全然昭示着坚韧不拔而英气逼人的抱负。通过这部书稿，我再次品味到他早年抱负之完美履践。

把邮票称为“方寸”，颇宜认同。方寸者，其义凡二：一谓形小，《孟子》云“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是也；一喻心田，《鹤林玉露》引俗语“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是也。今之邮票，其外在造型的细小，显然不过方寸之间；其美术构思的用心，却囊括历史文化的无限时空。由此观之，邮票，岂非于微小形态中寓含宏大心田吗？称之为“方寸”，断断乎恰如其分。

略览《方寸美术六十年》全书，不难看出，这是一部阐述新中国邮票设计艺术发展史的专著。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作者立足超凡脱俗的境界，揭示了邮票设计特定空间的学术、历史、实证诸方面的意义。缘此三端，谨说如次：

一曰，艺以传道的学术旨趣。

著述之旨，最重创获。此书历叙新中国“方寸美术”的始末，前无先例，堪称填补了中国邮票美术研究的一项空白。书中沿循我国邮票设计艺术六十年进程的主体线索，从逐

年发行的 400 余套邮票中寻找与美术有关的人和事，将邮票设计的美术事件与美术家的创作心路有机地结合起来，串联出一部图文并茂的“艺”与“道”息息相通的方寸美术发展史，读毕令人耳目一新，精神一振。是为弘扬学术之“传道”意义。

二曰，文以载道的历史印记。

评史之论，最需卓识。我十分欣赏的是，作者在阐述邮票美术设计历史的过程中，紧紧结合着新中国六十年发展的步履，让读者通过“方寸美术”的画面，感受到新时代前进的脉搏。全书所涉邮票设计事件，从 1949~2009 年，以每五年为一阶段分述：1949~1954 年是百废待兴，1955~1959 年是初显繁荣，1960~1964 年是百花齐放，1965~1969 年是“文革”风云，1970~1974 年是调整整顿，1975~1979 年是迎接春天，1980~1984 年是繁花似锦，1985~1989 年是改革创新，1990~1994 年是稳定发展，1995~1999 年是艺术新天，2000~2004 年是世纪曙光，2005~2009 年是走向辉煌。观此十二阶段之立意，岂不尽见新中国六十年阔步发展的雄伟气象？是为评述历史之“载道”意义。

三曰，术以明道的实证理念。

叙事之作，最宜实证。颇为难得的是，此书所涉人物、事件、作品、签名，乃至美术设计师的手绘稿本、创作对话，多是作者三十年来精心收集的第一手资料，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本书的可信度。中国古代优秀学者的治学传统，特别强调实事求是的考证精神。今天的学人，或有不少淡忘了这一传统，甚而信手摘取网络材料、道听途说，以至于持无根之谈者亦颇有人在，这是极为不佳的学术风气所致。本书作者则始终笃信传统，求实存真，以详确的例证阐明方寸美术之理，显然值得人们敬重而叹美之。是为坚持实证之“明道”意义。

总此三方面的意义，我以为，晓文兄的《方寸美术六十年》不仅是一部填补空白之作，也将成为一部集邮学界众口交赞的传世之作。我和晓文大学时代的老师周安达源先生，写给晓文的一封信说：“你研究的画面虽小，但做的却是一件大事。”我极为赞成周老师的这句点评。我相信，阅及此书的读者，只要用心体察，也一定会产生同样的感触吧？

2010 年 6 月岁次庚寅夏至后一日

写于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方寸美术六十年

Stamp Art in the Past Sixty Years

一、1949~1954 百废待兴 (All to Be Done)

1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新政权的筹建工作展开，邮票发行提上议事日程。庆祝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像、国徽、国旗搬上邮票，敦煌壁画等入选系列邮票；一批美术大师亲身参与设计或其优秀作品被选作邮票图案。



二、1955~1959 初显繁荣 (Initial Blossoming)

11

首个邮票选题计划实施，邮票开始关注美术作品，并从中选取图案，选题涉及古代科学家、长征、建军、关汉卿、剪纸等，至发行“开国大典”达到高峰；同时开始向社会美术家约稿。但“天安门放光芒”和“青年生活”邮票因政治原因，遭遇厄运。



三、1960~1964 百花齐放 (Contending Advance)

27

邮票选题不断拓宽，约稿作品大量涌现，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格局，出现了“金鱼”“菊花”“唐三彩”“梅兰芳”“蝴蝶”“黄山”“熊猫”“牡丹”和“金丝猴”等一大批优秀邮票。



四、1965~1969 “文革”风云 (“Cultural Revolution”)

41

山雨欲来风满楼。即便是前期选自名家名作的“遵义会议”“抗战胜利”“支越抗美”等邮票也已开始烙上政治烙印；随之，有关毛泽东画像、毛泽东手迹、红太阳、一片红的题材迅速占据方寸，至发行“毛主席去安源”达到登峰造极。由于政治风云变幻，停印、停发、停售的邮票达十多种。



五、1970~1974 调整整顿 (Adjustment & Reorientation)

57

邮票艺术禁锢开始松动，既有一批好的设计作品，又有一批好的美术作品入选邮票。“矿山新兵”“女委员”“我是海燕”都是精品，还有保留题款的“熊猫”国画，风格独到的“户县农民画”，大家的最初成名作“知识青年的榜样”等。



六、1975~1979 迎接春天 (Arrival of Spring)

71

即便是“批林批孔”“主将鲁迅”“女民兵”题材，也不乏名家名作，而“奔马”“科学大会”“工艺美术”更是预示着春天来临。“东北虎”“爱科学”“山茶花”“西游记”则是春天盛开的鲜花了。



七、1980~1984 繁花似锦 (Mushroom Growth)

85

这是新中国邮票艺术第二个繁荣时期。不仅有“齐白石作品选”“庚申年”“荷花”“科学家”“文学家”“石林”“红楼梦”“牡丹亭”“益鸟”“西厢记”等一批大师作品，更有“京剧脸谱”“西双版纳”“天鹅”“峨眉风光”等优秀设计作品面世。



八、1985~1989 改革创新 (Ground-breaking Development) 113

邮票评审机制的建立，为邮票艺术注入了活力。第一届邮票图稿评审委员会自1985年10月成立，至1989年11月，共召开评审会11次，并有12次的分散评审。此届评委会共评审邮票达103套，其中社会美术家交送的图稿占60%以上。



九、1990~1994 稳定发展 (Stable Growth) 149

第二届邮票图稿评审委员会的评审工作改为“评议”（1990年），同时邮票铭记结束了42年标注“中国人民邮政”的历史，变更为“中国邮政”（1992年）。此间，第二轮生肖邮票注入民间艺术元素，近现代画家作品选系列和工艺品系列的开启，都大大丰富了邮票的美术内涵。

149

十、1995~1999 艺术新天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Art) 175

“太湖”“九华胜境”“三清山”“黄山”等风光选题风格迥异，表现不同美术流派；“上海浦东”直接由地方组织选题、设计和印刷，当地画家联袂创作；第九届全国美展设立的艺术设计展区，“中国古代档案珍藏”等三套邮票入选并获优秀奖，都成为这一时期邮票艺术的亮点。

175

十一、2000~2004 世纪曙光 (New Century for Art) 205

进入新世纪，中国邮票在延续编年邮票体例的同时，邮票选题、设计也在不断地变革，主要体现了选题注重系列特色、设计意识有所加强、艺术形式趋于多样、印制技术不断更新等特点，但大部分作品依然出自国家邮政局邮票设计室的格局未变。

205



十二、2005~2009 走向辉煌 (Glorious Future of Art) 243

243

邮票印制局的专业设计师被授予“2005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称号，预示着邮票设计走向辉煌。而较多的平面艺术团队加入邮票设计行列、大量的名家名作入选方寸、民间木版年画的持续发行、多种科技元素注入传统艺术题材，都为提升邮票艺术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281

后记 (Postscript) 282



一、1949~1954 百废待兴



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新政权的筹建工作展开，邮票发行提上议事日程。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像，国徽、国旗搬上邮票，敦煌壁画等入选系列邮票；一批美术大师亲身参与设计或其优秀作品被选作邮票图案。

自 1949 年北平和平解放之后，新中国政权的筹建工作随即提上议事日程。当时的华北邮电总局即以“华北人民邮政”的名义积极着手筹备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纪念邮票的发行工作。1949 年 4 月 21 日，正式提出了筹印全国通用邮票的方案，方案所附邮票选题共有 7 种，包括：红五月（五一、五四、五五、五卅）纪念邮票、庆祝新政治协商会议纪念邮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纪念邮票、七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廿八周年纪念邮票、八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纪念邮票、远东劳动大会和妇女代表大会纪念邮票等。

1949 年 10 月 8 日，纪 1《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邮票发行。邮票原稿是著名画家钟灵和张仃设计的。艺术家钟灵在书法、绘画、邮票设计等诸多方面有着精湛造诣。他似乎与“新中国的第一”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一枚邮票——“宝塔山邮票”的设计者；是天安门上左右两条大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书写者；是新中国币制改革后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六字的设计者和书写者；他和画家张仃一同设计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天安门城楼上的八个大红灯笼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套纪念邮票，还参与设计了共和国国徽。回忆纪 1 邮票设计，钟灵深有感触：“那是 1949 年开国大典之前，我担任政协筹委会会场布置科科长，邀请我在‘鲁艺’认识的设计家张仃一块设计布置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会场。这时邮票发行局的同志来找我们，说要为政协一次会议设计一套纪

念邮票。接受任务之后，张仃和我立即干起来。在中南海瀛台‘待月轩’工作室，我们用铅笔很仔细地画。因为已经知道开国大典要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所以就画了天安门城楼和游行的队伍；为了表现对新中国成立的欢迎拥护和热烈庆祝，就画了中国人民表示喜庆之意的大红灯笼；新中国的空军在开国大典上要第一次露脸，这样让人高兴和自豪的事情当然也要画进去，于是又有了飞翔的空军。”钟灵指着画片中的邮票图案说：“那个时候干劲真足，不知疲倦，也不知休息，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三天就完成了任务。送交周恩来副主席，很快得到‘同意’的批示，于是就很快发行了。”钟灵曾经设计和参加设计新中国邮票 17 枚。共和国的第一套纪念邮票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它忠实地记录了中国人民对新中国成立的无比喜悦和欢呼之情，显示了共和国坚不可摧的雄心和力量。

1950 年 2 月 1 日，纪 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纪念》邮票发行。邮票图案仍由著名画家钟灵和张仃设计。据张仃回忆，他是借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将政协会议背景与毛主席讲话的姿势拼接组合成完整的画面。设计稿是用铅笔画在 16 开纸上。经办邮票的邓连普回忆说，当时他刚从上海安排纪 1 邮票的印制回京，张仃将设计的两幅邮票图案交来，邓看后即请张仃送领导审阅。张仃骑自行车到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秘书长李维汉同志处，经其签署同意意见后于 1949 年 9 月下旬交付印制。此时，纪 3 邮票图稿经向全国征集亦由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曹必慧和王丰润合作设计完成，并在一个半月后正式发行。纪 1、纪 2、纪 3 这三套以中国邮政为铭记的纪念邮票以首套群众游行、首套雕刻版、首套征稿等之最，为新中国纪念邮票开启了新的篇章。

1950 年 7 月 1 日，纪 4《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邮票发行。这是为纪念新中国成立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而发行的重要邮票。1949 年 8 月 29 日，华北邮政总局致函政协筹委会，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纪盛邮票（此系暂定名称）图稿贵会亦允代为绘制，本局至表感谢。惟邮票刻模制版排印等等，手续繁重，颇需时日。该项邮票，未知何日可以制就，贵会能否提前办理”。政协筹委会立即组织力量，委托纪 1、纪 2 的作者张仃、钟灵进行设计。初稿系根据当时一幅美术名作“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构思设计的。但初稿出



来后，邮电部领导并不满意，认为图稿中毛主席像是侧面的，而且头发太长，图稿上的五星红旗也缺乏动感。为此，专业邮票设计师孙传哲参照画家黎冰鸿1949年画的一幅毛主席素描画像对图稿进行重新绘制。在黎冰鸿画的素描像上，毛泽东头戴军帽，脸上露出自信的微笑。孙传哲除以简练的线条勾画毛主席像外，在绘制中还将原稿中呈平面形的五星红旗改画为凌空飘扬的形状，又将票型由横版改为竖版，以表达“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气势，使画面增添了庄严感。庄严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中国邮票上出现。毛泽东主席、宏伟的天安门以及接受检阅的人民解放军的坦克、飞机，都形象地记录了新中国开国盛典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1980年，在新中国成立30年最佳邮票评选中，纪4被评为最佳邮票，正说明了祖国和人民对它的评价和珍视。

1950年8月1日，纪5《保卫世界和平》邮票发行。原稿选自世界著名画家毕加索为1949年4月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召开的第一届世界人民和平大会创作的和平鸽。此和平鸽图“象征安详幸福的和平生活”，因此广受欢迎。此后的纪10（1951年8月15日发行，新中国第一套三角形邮票）亦采用了毕加索的和平鸽图案。这套邮票图案上的和平鸽是毕加索为1950年9月在华沙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人民和平大会而创作的，飞翔的和平鸽“表示当时的和平运动已经展开”。1940年，德国法西斯攻占了巴黎。毕加索的邻居米什老人的孙子被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匪徒扔到了楼下，惨死街头，匪徒还用刺刀把他养的鸽子挑死。毕加索怀着悲愤的心情，挥笔画出了一只飞翔的鸽子——这就是“和平鸽”的雏形。后来，为纪念在华沙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毕加索又欣然挥笔画了一只衔着橄榄枝的飞鸽。



1950年10月1日，纪6《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一周年纪念》邮票发行。邮票首次以五星红旗为主图。五星红旗设计者是上海的曾联松。

1949年，当曾联松读着7月13日的《解放日报》时，对其中政协一届会议筹委会刊载的国旗图案征集启事产生了兴趣，时年32岁的他跃跃欲试。酷暑之中，曾联松天天伏在现代经济通讯社职工宿舍的书桌旁。他从“盼星星”以及毛主席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得到启发，一颗大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四颗小五角星则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经过反复修改，五星之间确定了位置，四颗小星环拱于大星之右，并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的中心点；旗面为红色，寓意革命如红霞一片；五星位于旗面的左上方，似闪闪星辰居高临下，金光闪闪辉映大地。此图准确地体现了国旗征稿启事中所要求的中





国特色和政权。他珍藏至今的 1949 年 9 月 29 日的《解放日报》，头版第一次套红刊出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曾联松说，由于报上没有刊登设计者的名字，他直至一年后收到赴京参加开国一周年庆典通知才释然；至于知道五星图案通过的内幕那更是以后的事了：9 月 25 日，张治中接到通知，要他去中南海参加关于国旗设计的专题讨论会。毛泽东拿出五星图案问道：“这是 32 号设计图，大家看怎么样？”这个图案是由国歌作词者、艺术家田汉事先向毛泽东推荐的。经过这次表态，与会者的意见几乎全倾向五星红旗的图案。不过，还有几个人当场表示异议，如果这四颗小星是代表四个阶级，那我们进入社会主义不就又要更改国旗了？毛泽东立即回答：“我看这样，是不是把这个说明改一改，不要说四小星代表四个阶级，就说五星红旗这个图案表现了人民的大团结。我们不但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现在也好，将来也好，我们又是团结又是革命，大家看好不好？”毛泽东的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到 9 月 27 日投票表决时，五星红旗图案顺利通过了。9 月 30 日在政协一届会议的闭幕式上，主席台悬挂了鲜艳的五星红旗。次日，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上亲手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如今，它已作为重要的革命文物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展室里。

值得一提的是，国旗多次出现在新中国邮票上。纪 6《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一周年纪念》邮票，是新中国第一套以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为主图的纪念邮票。此票全套枚数和圈幅大小，正好与邮票上的一大四小的五星图案相呼应。邮票正中的国旗旗杆缀有“1”字以及橄榄枝，既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开国一周年，又象征我国人民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的和平建设。邮票是由新中国第一位专业邮票设计家孙传哲设计的。根据有关部门的意见，他还设计了一枚与邮票图案相同的首日封，但该封因故停止发行，只有少数被原邮电部作为纪念品赠送给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20 世纪 80 年代第一春，中国文坛前辈、老集邮家夏衍看到了孙传哲仍然保存完好的这一首日封，不禁欣喜异常，当即在此封上签名留念。后被评为新中国成立 30 年最佳邮票的纪 4《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邮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主管部门发行的新中国第一套印有国旗图案的邮票，也是孙传哲调到北京原邮电部邮政总局后修改设计的第一套邮票。而且，从此票开始统一使用“中国人民邮政”名称。此后，以五星红旗为主图的邮票有：纪 60《一九五八年农业大丰收》（1959 年 4 月 25 日发行，孙传哲设计）、J.4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第一组）》（1979 年 10 月 1 日发行，万维生设计）和 23T《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2004 年 9 月 30 日发行，方军设计）等。

1951 年 7 月 1 日，纪 9《中国共产党卅周年纪念》邮票发行。邮票上的“毛主席侧面像”出自张松鹤之手。早在 1948 年，张松鹤从部队转业留在华北大学文艺学院担任美术专科的班主任时，他就开始创作规格大小不一的毛主席浮雕像，当时国内有许多地方的毛主席像章都是用张松鹤设计的翻版。作为新中国雕塑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由于张松鹤画毛泽东像最多，水平也高，所以在 1950 年受胡乔木之邀，与辛莽、左辉合作绘

制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泽东巨幅画像。其毛主席侧面像后来成了“文化大革命”时期传播量最大的宣传艺术品，但即使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也很少有人知道，自己胸前佩戴过的像章，原浮雕的作者是张松鹤先生。1967年5月，在清华大学校园里立起了第一座巨型毛主席全身雕像，此后，毛主席塑像遍及全国。我们今天还可以在不少美术作品中看到的毛主席雕像，是张松鹤与他人合作，于1977年为毛主席纪念堂设计创作的《毛主席坐像》。

除了雕塑大量的毛主席像外，张松鹤还创作了大量鲁迅的雕塑，有著名浮雕《鲁迅像》《鲁迅半身石雕像》《鲁迅胸像》，1976年10月19日发行的J.11《纪念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邮票第1图《鲁迅浮雕像》就是张松鹤创作的。



1951年10月1日，特1《国徽》邮票发行。国徽的设计始于1949年。6月16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委会一次会议，决定设立6个小组，其中第6小组负责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案，并设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推选叶剑英、廖承志等8人为委员。7月15日起全国七大报纸刊登方案征集启事。到8月20日截稿时，共收到应征国徽图案900幅，但均未被选中。8月28日，政务院召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开会讨论国徽图案时，参加国徽图案设计工作的高庄在会上说：“在塑造国徽模型时，我有一种愿望，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健康、更坚强、更程式化、更统一，并赋予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以冀我们的国徽的艺术性提到国际水平，永放光芒。”1950年春，成立了由中央美术学院（国立艺专）和清华大学两个创作组参与设计国徽，中央美术学院小组包括张仃、张光宇、周令钊、钟灵等，清华大学由梁思成、林徽因、汪国俊、朱畅中、胡允敬、莫宗江、李宗津、张昌龄、罗哲文、高庄等人组成设计组。中央美院设计方案，中央为一幅天安门城楼建筑斜角透视图，左大右小，右边画有一根白色华表，使画面得以平衡。画面上还表现了蓝天、黄瓦、红柱、红墙、灰白色的金水桥栏杆和大石块路面。外环基本采用政协徽外圈形式，由金色麦穗齿轮等组成。清华设计方案，中央采用天安门金色正面图，上空嵌有金色五星，背衬红色天空和大地，外圈左右由金色稻麦穗环拱，下端由红绸缠结在金色齿轮上。最终确认的是清华大学方案。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通过了国徽图案，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通过了政协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设计图案的说明》。国徽的定型最终由高庄完成。在修改国徽图案和塑造国徽立体模型的过程中，高庄参考了大量资料，还买了一尊佛像和几方秦、汉、隋、唐的铜镜来参考、借鉴。为了使国徽更完美、壮观，他把做好了的国徽石膏模型与原平面图案放在一起，让人们比较评论，听取意见，不断修改。从1950年6月底到8

月中旬，高庄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日臻完美的国徽模型终于完成。8月18日，国徽审查组通过了这个石膏模型，9月20日，国徽图案正式颁布。国家对参与国徽设计的梁思成、张仃、林徽因、张光宇、高庄、钟灵、周令钊等每个人奖励800斤小米。当年制作的石膏国徽模型仍被高庄珍藏。



1951年10月19日，纪11《鲁迅逝世十五周年》邮票发行。此票选题是1950年学者唐弢与邮电部长朱学范在北京的一次见面上提议的。1951年初朱学范给许广平写信，请提供鲁迅照片。6月27日，邮电部将有关设计图案及说明文字送交文化部“请研究示复”。7月10日，文化部复函提出意见：“（一）鲁迅像可偏于邮票右方；（二）诗句改直行，在鲁迅像左方，稍低于像；（三）原写诗句地位，改写‘鲁迅逝世十五周年’及‘一九三六、一九五一’之亚刺伯字，横写。原两角之‘一九三六、一九五一’之亚刺伯字取消。”定稿后邮票上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为鲁迅亲笔手书。据《鲁迅日记》1932年10月12日记载：“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云云。’此诗原无题，在编入《集外集》时，鲁迅题名《自嘲》，并将日记中的‘旧帽’改成‘破帽’，‘破船’改为‘漏船’。邮票上的两句诗的手稿和签名手迹是从1932年的条幅中剪贴拼成。1966年12月31日，纪122《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邮票第3图再次使用鲁迅手书，亦与纪11同出一处。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
——鲁迅

1951年12月5日，邮电部朱学范部长和王铮副校长致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提议1952年发行纪16《抗日战争十五周年纪念》(7月7日发行)、纪17《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廿五周年》(8月1日发行)和纪19《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二周年纪念》(11月

15日）三种邮票。纪16还由邮政总局派专人请画家吴作人代为设计一种画稿（后未采用），后由邮票设计家孙传哲根据有关照片和美术图稿完成了三套邮票的设计。其中纪16的《平型关胜利》和《领袖策划反攻》参考了沙飞和徐肖冰的摄影作品；纪19的《志愿军出国作战》和《支援前线》参考了邵宇和王式廓的美术作品，《涉江追击敌人》和《胜利会师》参考了张崇岫摄影作品。

1951年下半年，邮票设计及选题开始实行年度计划。12月15日，邮政总局将1952年度纪念邮票和特种邮票计划上报邮电部，10天即获批准。所列14套邮票除《毛主席六十寿辰》和《李大钊逝世廿五周年》纪念邮票未发行外，均顺利发行。

1952年7月1日，特3《伟大的祖国——敦煌壁画（第一组）》邮票发行。邮票图案选自1951年在故宫举办的敦煌文物展览会。此系列的五组邮票中还有1953年9月1日发行的第三组亦属“敦煌壁画”选题。这八幅画面分别是：第一组的《狩猎图》，取材于第285窟西魏大统年间的窟顶壁画，表现猎手引弓待发，射猎牦牛；《隋代供养图》以高大持花贵妇人与随从对比表现隋代不同阶级身份；《双飞天》取材于第320窟盛唐说法图壁画，给人以“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优美感觉；《乘虎天人》（邮票原图名为《龙·唐》，误将虎作为龙）取材于第329窟初唐龛顶壁画，表现天人驾驭着奔驰的虎遨游太空。第三组的《马夫与马》取材与第288窟西魏壁画上部，表现马夫驯调骏马，准备骑乘的瞬间；《金刚力士》取材于第288窟西魏壁画下部，力士舞姿雄壮，举手托山气度磅礴；《作战图》取材于第296窟北周壁画“得眼林故事”，手持盾牌弓箭的武士对抗全副武装的骑兵的攻击；《供养人及牛车》取材于第329窟初唐供养人行列中的牛车。这些图画均根据著名画家常书鸿等对敦煌的描摹图设计而成。20世纪40年代，常书鸿和其他艺术家们坚守石窟，临摹壁画，没有梯架设备，没有照明器材，就在小凳上工作，一手举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临摹窟顶画时，头和身子几乎成90°直角，时间一长，就会头昏脑胀，甚至恶心呕吐。就这样，到1948年，他们完成“历代壁画代表作品选”等十几个专题，共选绘摹本800多幅，为后人了解敦煌留下大量的史迹。正如日本现代美术评论权威柳亮先生所说：“从敦煌早期壁画中，可以体会到埃及墓中壁画风尚；可以看到拜占庭艺术；可以看到罗马艺术风尚……不管希腊、罗马艺术如何崇高……我说敦煌艺术是虎虎有生气的东方人类文明曙光，是20世纪现代绘画的祖先。”常书鸿为敦煌艺术的发掘与弘扬，倾注了十余年的心血，被誉为敦煌艺术的保护神。这也使敦煌壁画的绘画作品能较早以系列形式登上早期新中国邮票。“伟大的祖国”系列邮票的另三组（第二组、第四组和第五组）除二、四

